

坚定理论自信 实现民族复兴

编者按: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展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新发展。8月23日下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会)举行“为迎接十九大胜利召开做好思想理论准备·增强‘四个自信’”系列理论研讨会,围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月26日重要讲话有关重要论述,以“理论自信与民族复兴”为主题进行研讨,现将会上部分发言登载于下,以飨读者。

理论自信是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根本方向的自信

陈红娟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实践充分证明,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造福人民;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凝聚民心,聚共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指明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创新性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论理基石。同时,中国共产党汲取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根据不同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呈现的时代主题,结合中国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产生了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可以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我们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成功应对了来自各个领域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上彰显了巨大优越性、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力。中国为整个人类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提升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信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规律的认识,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断提高对人类社会发规律认识的独创性理论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

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共同文明成果,结合中国国情,独立自主探索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建立在中国人民辛勤的劳动不断地积累创新的基础上。这条现代化道路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统天下”的格局,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红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结和提升这条独特现代化道路实现过程中积累的历史经验,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规律的认识,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根本方向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正确、科学的理论能够指引方向,收获满满;反之,错误的理论指导实践,就会南辕北辙,一无所获,甚至遭受巨大挫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理论,反映并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规律,指引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不断前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经过反复实践验证和比较得出的、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我们应该信心满满、坚定不移地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归根到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的自信。我们应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必须始终不渝地坚定理论自信。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理论自信是对人民美好生活价值追求的自信

孙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叮嘱全党,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本价值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的中国社会发展,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首先,这一价值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和社会主义不能动摇的初心。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的学说,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批判而产生的科学理论。资本主义尽管开辟了人类发展的新纪元,但它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是导致了人对人的剥削和奴役的发展,社会主义就是要消除这一发展态势,确立起新的发展模式,将人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解放出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也是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过程。

其次,对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贯穿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过程。从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后,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都是围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展开的,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用人民群众共享的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富裕幸福生活来定义的。在“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论述了要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特别是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用人民的期盼来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幸福生活的价值目标开辟了新路。尽管实现人民幸福是所有无产阶级政党共同的价值追求,但社会主义运动却并没有顺利地推进这一进程。在夺取和巩固政权后,无产阶级执政党究竟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哪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很清楚地回答了这一时代命题,确立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紧紧把握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和最大

实际,为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有效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才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为人民幸福美好生活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

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推进人民共享的幸福生活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其创造性的贡献在于精彩地运用了历史的辩证法来破解所遭遇的难题。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另一方面,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好也是社会主义必须体现出的本质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则科学把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对矛盾的重心所在。

中国共产党将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建立在科学的政策演进基础上。“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努力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共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

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中共十七大进一步调整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中共十八大在收入分配方面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同步”和“两个提高”,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精准扶贫开辟了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加快经济发展后的雄厚积累彻底扫除贫困的新篇章。5564万中国人摆脱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总人口总数。未来3年,还将有4335万人脱贫。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了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小康,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这是中国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发展树立起来的历史丰碑,对此,难道我们还不应确立起强大的自信吗?

(作者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在分析鉴别、吸收借鉴国外理论中增强理论自信

权衡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7.26”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等。这些讲话精神明确指出,坚持理论自信既要始终立足中国道路和发展实践,也要吸收借鉴国外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最大来源和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践,从实践中不断进行新提炼、新总结和新概括。另一方面,强调理论自信,也要高度重视对国外理论的分析、吸收和借鉴,因为我们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本身不是封闭、静止的,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鉴别、比较、吸收、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进而也是不断增强理论自信的过程,因此吸收借鉴国外理论,也是理论更加自信的表现。为此,我们始终要保持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精神境界,注重融通各种资源,在学习中加以分析,加以吸收借鉴,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发展,不断增强理论自信。

吸收学习国外理论,核心是增强中国理论的说服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关键问题是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学风。首先,坚持立足实践基础并进行国内外比较,由此不断提高中

国理论的说服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其次,要对国外理论进行理性分析、鉴别,对其合理、有用的观点、方法积极加以吸收和运用,推动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特别要摒弃把西方理论当作“唯一准则”,简单地用“理论裁定”来判断我们的实践是否正确的态度。第三,在学习鉴别中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强调理论自信,不是说闭门造车,也不是夜郎自大,甚至盲目自信,而是要在学习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客观分析西方理论产生形成的国情背景、历史阶段、文化价值等因素,哪些是可以吸收借鉴的,哪些是不合理的;防止不加分析,简单套用国外的理论观点、知识概念等来指导中国发展的实践,也反对把各种知识和概念进行生搬硬套,机械化利用。第四,在吸收西方理论过程中要注重创新和构建话语体系,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要防止简单

套用西方理论的话语,防止“话语霸权”及其影响,要运用国内外都能听得懂的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概念体系进行交流和对话,通过话语体系相互转换,提高我们的理论创新能力,增强理论自信。最后,吸收西方理论,增强理论自信,一方面也要推动我国的理论走出去,能够和国际学术界、理论界进行积极对话,提高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理论为人类文明对话和交流做出新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大胆引进来,吸收国外的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想家、理论家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到中国来,深入了解中国实践,了解中国故事,提高中国道路和实践发展的影响力,通过拓宽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增强中国理论的说服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创新新闻传播理论 回应时代重大命题

张涛甫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5·17”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新闻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支撑性学科,现有的学科实力、学术贡献度以及话语能力与这场深远的社会变革所提出的吁求比起来,还有不小的距离。虽说其他学科同样也存在这样的差距,但新闻传播学的紧迫性更强,这是因为新闻传播学已深处新媒体技术带来的影响当中。新闻传播学面临的问题领域被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闻传播革命打开了全新的疆域,新闻传播学从来没有遭遇过现今这么深刻且广泛的冲击和挑战。这些冲击和挑战使得原先那些确定的理论命题需要修正、升级和完善,甚至会给原有的理论话语存量带来颠覆性的冲击。面对新的媒体现实和高度媒介化的世界,如何从中穿越而过,进而把握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性?在资讯严重过剩,社会现实与虚拟世界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时代,在“无社交,不新闻”的“后真相”时代,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揭示真相,满足人民全面客观正确地理解中国和世界的要求?如何对关联变量发生了几何级数增长的复杂媒介系统进行理论提炼和概括,增强理论的硬度,让理论变得有解释力和预见性?如何让理论更好地指导媒介实践,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创新。笔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创新,须要兼顾以下诸个面向。

需要基于中国立场的理论创新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几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理论资源上做“增量”,努力把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知识移植到中国来,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资源的快速繁殖,但这种去语境化的理论移植,与中国问题缺乏根本性的关联,移植缺乏“在场”感。表面上看,似乎我们不缺少理论,别人有的,我们这里也会有,问题是,这些理论“浮标”,不是内生于中国语境,与中国问题缺乏结结实实的关联,致使一些在西方颇具理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到了中国语境就沦为空洞的学术修辞。这种游离于实践之外的理论生产,被有些学者认为是“言语的学说”,是一种“炫耀性的理论工作”。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一直存在自主性不足的问题,这固然与这个学科还比较年轻有关,但关键还是在理论创新不足,主要表现为:自主生产的新闻传播理论资源较少,大多依靠外援,很多理论框架是靠其他学科以及国外“接济”的。新闻传播学领域不是一个理论建设需要,也不仅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话语的理论元命题,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具有的理论优势和道义优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是人民报刊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基于纸媒时代的理论判断和思想命题。这一理论判断和思想命题经历了170多年的实践淬炼和理论考验,始终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and 价值感召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不是抽象的理论教条,也不是任人打扮的理论新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

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盘”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基本盘”。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不仅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也不仅因为它是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话语的理论元命题,而是源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所具有的理论优势和道义优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是人民报刊思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基于纸媒时代的理论判断和思想命题。这一理论判断和思想命题经历了170多年的实践淬炼和理论考验,始终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and 价值感召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既不是抽象的理论教条,也不是任人打扮的理论新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

对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当如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离开这一理论和思想的源头,我们的理论和思想创新就会失去历史方位和时代方向。

回应时代重大命题

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抽象,它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一个理论如果不能回应实践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理论的合法性就会虚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创新乏力,首先表现在:理论研究对生不息的新闻传播实践缺乏有力的回应,尤其是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鲜有正面、有力的回应。当下中国是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而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变化更为深刻。中国社会转型正好遇到以移动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闻传播革命,这双重变革叠加在一起,释放出天量级的能量,对当下中国构成重大影响。传播系统作为连接社会系统各个器官的传感系统,其功能不是局限于局部,而在全局。如今,中国传播系统的内涵、结构、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能够紧跟新闻传播实践的深刻变革,有力回应来自实践一线的挑战,进而破解重大难题。但是,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恰恰与发生剧烈变革的实践存在极大的落差。造成这种落差不能简单归咎于新闻传播学界自身,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第一时间关注着实践的潮汐涨落,那些批量生产的研究成果,皆是我们的新闻传播研究者在海边捡拾的知识贝壳,其中有不少亮点之作。问题是,新闻传播学变革太快,影响太深广,这些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理论能力极限,现有的理论存量难以承载超重的实践问题。在天量级的新闻传播实践面前,现有的理论支点已经支撑不起。一些核心概念、理论框架、分析逻辑远远透支,不能系统地解释实践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结果是,我们只能在理论上

在持续的理论创新中不断增强理论自信

刘光峰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国家文化的复兴;而文化复兴则伴随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理论创新史;两次大的理论飞跃,在持续的理论创新中不断增强人们的理论自信,指引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砥砺前行。

中国共产党人革革命、搞建设、抓改革,其目的都是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重点,但所有碰到的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来得及深入探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还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也是理论创新最重要的增长点。90多年来,我们党以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及时

地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谱写伟大思想的新篇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不二法门。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遇到的问题,既有实践问题,也有思想认识问题。我们党注重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重视解答干部群众思想上的疑问。如,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等等。这些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都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创新理论的过程。这些令人信服的回答,就是创新的鲜活理论。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二为”方向、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提炼和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有力指导了我国建设实践。对这些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结论,我们党坚定不移坚持;同时会根据时代变化和现实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注重在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学说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从世界政治实践的实践中,虽然各国政党的执政模式不同,性质、信仰、纲领、执政理念、社会基础千差万别,但作为执政党,这些党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仍有一些共同规律。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迅猛发展

形势下,一些执政党加大自身建设力度,取得显著成效,其做法和经验,如根据形势变化革新理论纲领,以使政党在思想理论纲领革新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又如扩大党内民主,增强自身吸引力和凝聚力,吸引、选拔高素质的人才,建设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再如加强决策过程的民主参与,增强决策的权威性和党员对决策的认同感等等十分值得研究、借鉴。我们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研究和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重视在对国外经验借鉴与创造的统一进程中推动理论创新,所创新的理论,博采众长,既有内容的更新,也有形式的改变,展现了高远深邃的政治见地和智慧。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锻造话语体系的“语法”

这里的话语“语法”是指理论话语的范式。理论研究缺乏范式,就会缺乏逻辑,容易被概念和感觉带向歧途。理论范式代表由某一科学社群成员共同的信仰、价值、技术等所构成的整体,能够为这个整体中的某一部分回答问题解答,或作为常态科学探究中解答谜题的基础。范式将科学探讨的问题定向在一个范围内,具有世界观及方法论的作用,是科学社群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理论范式之所以重要,概在于它是理论话语的“语法”,是理论研究的“铆钉”和“卡槽”。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经由这几十年来的发展,话语资源已非常丰富,问题是这些散乱的话语资源,缺乏内在的逻辑秩序,即便我们用几个理论框架将一些概念、理论话语分为几种类别,但多是目录学意义上的分殊,不是理论内在逻辑上的区隔。当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话语生产甚为活跃,但这不足以说明该学科具有强劲的话语创新能力。其实,这是一种表面上的话语繁荣。原因在于,该学科的话语尚不成熟,内生逻辑尚不严谨,很多命题,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以至于新闻传播学话语难以形成自洽的逻辑链条。当前,新闻传播学的话语语法还未打造成型,理论硬度不够,以至于话语生产建立在一个松软的层面上,这是需要我们新闻传播学学科为之努力的一个重要任务。

总之,当下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佳时期。在这个时期,需要各个学科超越学科界限,回应时代呼唤,回归对“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立体观照,实现整体性理论创新的整体性“爬坡”。新闻传播学研究者身处新闻传播革命语境下的中国现场,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理论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今后的理论大突破做好了很好的准备,接下来需要整体发力,把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话语体系提升到与时代匹配的高度。(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